

紅旗飄飄



1



第 1 集 1957 年 5 月 15 日出版

目 次

編者的話	3
老共青團員回憶錄	
在紅色的搖籃里長大	張金錫講 5
共青團——我的母親	溫濟澤 13
“紅軍不怕遠征難”二章(小說)	陳靖、黎白 19
深山苗歌	19
雲嶺雪海	41
一個紅軍的經歷(上)	張友濟 52
回憶廖仲愷	何香凝 75
鄧中夏同志在北大	馬非百講 88
紀念羅登賢同志	薛 雯 93
和魯迅先生在廈門	島 95
山城的榮哀——聞一多	靖 106
鄒子侃舍身	正 122
女紅軍張吉蘭	夢 岩 129
同志·老師·戰友——憶錢毅	陳登科 135

桃子又熟了……——忆倉夷……………蕭 殷 152

我的引路人……………海 默 172

战友徐坦……………高 魯 190

紅軍之母……………張 羽 203



第 1 集 1957 年 5 月 15 日出版

目 次

編者的話	3
老共青團員回憶錄	
在紅色的搖籃里長大	張金錫講 5
共青團——我的母親	溫濟澤 13
“紅軍不怕遠征難”二章(小說)	陳靖、黎白 19
深山苗歌	19
雲嶺雪海	41
一個紅軍的經歷(上)	張友濟 52
回憶廖仲愷	何香凝 75
鄧中夏同志在北大	馬非百講 88
紀念羅登賢同志	薛 雯 93
和魯迅先生在廈門	島 95
山城的榮哀——聞一多	靖 106
鄒子侃舍身	正 122
女紅軍張吉蘭	夢 岩 129
同志·老師·戰友——憶錢毅	陳登科 135

桃子又熟了……——忆倉夷……………蕭 殷 152

我的引路人……………海 默 172

战友徐坦……………高 魯 190

紅軍之母……………張 羽 203

讀者的話

几年来，根据广大青年讀者的反映，他們迫切需要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讀物。

“中国革命胜利以前，中国共产党員和許多革命者，不怕杀头，不怕坐牢，他們离乡别井，东奔西走，不計名利，不图享受，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禍福。他們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，英勇牺牲，艰苦奋斗，前面的人倒下去，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；革命失败了，馬上重振旗鼓，繼續战斗。”^①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，有着多少可歌可泣，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事迹！但是这一切，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，并不是很熟悉的。因此，他們要求熟悉我們人民革命的历史，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，建設壯丽的社会主义事业，保卫我們偉大的祖国；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，不怕任何艰险，勇于克服困难，无限忠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。讀者的心情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过去，我們出版过一些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讀物，但是，还远远不能滿足广大青年讀者的需要。我們感到最困难的是：熟悉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作者，往往沒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写作。同时，写一部較完整的描写英雄人物的傳記小說或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，往往需要較長的时间。这样，就使我們未能更多的出版这类讀物。

为了滿足广大讀者的迫切需要，我們除了組織各方面的作者，写作这类讀物以外，同时，我們筹办了這個專門发表描写英雄

① 引 1957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論。

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叢刊。

叢刊上所刊載的文章，有長有短，体裁不限。有傳記，也有小說，有回忆录，也有一般的記叙文。有描写革命領袖、革命先烈、著名英雄人物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；也有描写无名英雄及革命斗争中各方面生活的文章。这一集偏重刊登历次革命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文章，今后也准备刊登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、以及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的文章。

創刊伊始，編輯部力所不及之处，定会产生很多缺点，甚至是錯誤。这就需要广大讀者的批評和指正；需要广大作者——領導同志、老革命干部、作家……为本刊撰稿。只有在广大讀者和广大作者的支持下，才能使我们这个初生的刊物，逐漸办好。我們热忱地期待着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“紅旗飄飄”編輯部

1957年5月

老共青團員回憶錄

編者按：這一集，我們選輯了兩篇老共青團員的回憶錄，作為向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獻禮。

文中所回憶的種種，已成為遙遠的往事。當時我們對敵鬥爭所採取的策略，不完全是正確的，甚至是有錯誤的。但是前一代革命青年的英雄氣概，和自我犧牲的精神，是永遠值得我們景仰與學習的。

當時這些年青的革命家朝夕嚮往為之奮鬥的理想，今天已經成為現實。但是，在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中，仍然存在不少新的困難，這就需要我們年青的一代，繼承並發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，把我們的青春獻給偉大的、壯麗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。

這一類文章，本刊今後打算陸續刊載。希望當年的共青團員同志們，能把他們經歷過的鬥爭事迹寫出來，交本刊發表。

在紅色的搖籃里長大

張金錫講

參加共青團

我是河北蠡縣辛興鄉人。1927年，我到城里的高小讀書。當時能在學校里念書的，多是一些商人、地主和富農的子弟。我的家

庭經濟情况不大好，仅能自給自足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当然比不上那些富家子弟。他們常常譏笑我“一脚牛糞一脚泥巴的人，也來念書哩！”我只把他們的話当做耳边风，不理他們。我有时气不过，也只狠狠地瞪他們几眼。我和那些只会貪吃貪玩的地主子弟不同，学习用功，功課比較好，每逢考試，总出不了前五名。在学校里，我最喜欢的有兩個老师：一个是地理教員刘宪曾，一个是語文教員宋勃舟。他倆都是共產黨員，看見我的出身很好，成績也不錯，又經常参加学校里的一些公益活动，就在那年的寒假里介紹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自从加入了共青团，我的眼睛仿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我的身体里也仿佛增加了一股新的血液。我的斗争生活，就此开始了。

扫掉恶霸的威风

我們乡里，有家姓閻的恶霸，弟兄八个，个个象凶神恶煞，为了芝麻大一点小事，都要和人打架，动不动拿出牛耳刀来吓人，大家都不敢惹他們。閻家家里还养着几百只羊，每年谷雨后麦苗都長出来了，他們还把羊赶出来放青，糟踏地里的麦苗。村里的人都恨得牙根发痒，只是沒人敢出面和他們講理。我从前在家里，常常听见村里的父老背地里罵閻家缺德。我年紀很小，知道閻家的霸道，也不敢得罪他們。自从我参加共青团之后，在团的教育下，对革命有了初步認識，对反对恶霸也就有了决心。我把这件事情向团組織一反映，一場反对恶霸、爭取群众的斗争就热烈展开了。

1928年春天，我放寒假回家之后，就找了二十几个人来开会。这时，我們学校里有一个叫張承曾的老师，也从县里来了。他是一个共產黨員。我們在会上把閻家的罪行一說，大家看見有人敢出来作主，馬上精神起来了，都說：“閻家太欺侮人了，这是騎在人家脖子上撒尿嘛！”也有人說：“打架有我們，怕什么？”开完会，我們心里更有底了，决定等閻家的羊再到麦地去吃麦苗，就跟他們到县里去論理。

有一天晚上，天上刮着大风，閻家的羊群又在麦地上啃麦苗

了。我們馬上集合了三十幾個人，各人拿着根棍子，到麥地上去。還沒走到那里，就看見一大群羊正在啃麥苗，沒有被啃掉的，都給踩壞了，大家馬上去找羊倌講理。這個羊倌姓王名有，住在我家的斜對面，我和他本來就很熟。我對他說：

“王有，你為什麼在人家的麥地里放羊？”

“東家又沒給我草料，我不把羊趕到這里，你叫我趕到哪里去？”他也是一肚子氣。

我們商量了一下，覺得這件事全怪姓閻的這個惡霸，不能怪羊倌，決定連夜把羊趕到縣里去論理。我和羊倌一說，羊倌揮了一下鞭子，吆喝一聲，就和我們一道把羊趕到縣里去。

我們幾十個人趕着一大群羊，浩浩蕩蕩到了城里。羊群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咩咩地叫着，把街上的人都吵醒了，大家都打開門戶出來看熱鬧。我們城里的老師和同學，有不少黨團員，他們當然支持我們。我們的聲勢更大了。

隊伍到了縣政府的門前就停了下來。我們派人去把縣長請了出來，當着他的面，我從羊群里拉出一頭羊來，用鋤刀把羊鋤死，剖開肚子，只見青綠綠的一肚子的麥苗。一連鋤了幾只，都是這樣。縣長見了，沒話可說，只得派了幾個警察把那個姓閻的找去。等到把那個家伙帶到公堂上來，縣長當堂判決：今後養羊，決不准隨便放出羊圈糟踏庄稼，違者從嚴處罰。姓閻的那個家伙連連說了幾聲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吩咐王有把羊趕回家去了。

這件事情，真是惊天動地的大喜事，閻家的威風，就這樣給我們掃掉了。村里的人都說：“咳！小學生倒能辦大事情哩！”

組織雇农爭工价

我們村里，有一個土地廟，廟前有一塊空地。村里的人，有事沒事都喜欢到那里去。村里那些雇农和一些做零活的，每天早上都拿着鋤頭扁担到土地廟前，等候地主富农來雇用。他們做的活是臨時講的，愛給多少就是多少，不能討价还价。雇工們的工价很低，每天除了東家給的兩頓稀飯和窩窩頭，只有一毛二分錢，家里

的人只好吃糠咽菜了。那时，我們共青团在村里的活动，除了那次反霸斗争，平时只搞一些宣传活动，沒做什么具体工作。有的老乡說：“共产党說的倒好听，就是怕成不了什么气候！”我想：要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光靠嘴講不成，就决定組織雇工爭工价。

有一天，我到土地庙前找了六七个雇工，向他們講地主老財怎样压低雇工們的工价，还和他們商量好，不加到一毛五不下市。

我們村里，除了姓閻的这家恶霸，还有一个姓董的地主，也是一个刁鑽狡猾的家伙。那天，他的管家到土地庙前来雇人，看見那几个雇工都不动，定要加到一毛五才肯下市。他跑回去向姓董的地主一报告，那个刁鑽狡猾的家伙偏着腦袋想了想：一毛五才下市？地里的活路又不急，不会去找旁人来干活么？心里打定主意，他就吩咐他的管家另外找人来干活，还叫人到那几个雇工的家里去串門說：咱們是乡亲里道的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？跟共产党走有什么好处？那几个雇工因为沒有工做，掙不来錢，家里沒有飯吃，又碍于乡亲面子，終于只好下市了。我們第一次組織雇工爭工价的斗争，就这样失敗了。

这一次失敗以后，我們开了个会，总结失敗經驗，决定分头去做宣傳鼓动和組織工作，向雇工們講我們人多力量大的道理，只要我們大家团结一心，地主老財就要低头，不得不加工价了。同时，我們还决定了最重要的一着：一到麦收，地里的活最忙的时候，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爭工价斗争。

我們开完会不久，眼看麦子熟了，財主們爭着雇人割麦子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們提出收割一天麦子不給五毛錢不下市的口号。当时，为了領導这个斗争，中共蠡县县委的刘魁同志也从城里来了，他是負責宣傳工作的。刘魁同志說：“千人一条心，泥土变黄金，只要大家团结一致便有力量。”最后他还說：“老乡們，誰要是不漲工价就下市，就是对不起乡亲們了。”

这天早上，董家的管家又大搖大摆到土地庙前来找人干活。雇工們都坐在地上不动，連瞅都沒瞅他一眼。那个管家一看苗头不对，找了一个年紀稍大的雇工，低声問：

“割麦子，一毛五一天，管飯。要去就跟我走。”

“一毛五？还不够吃稀飯呢！你沒听說不給五毛錢不下市嗎？別再罗苏！”旁边一个青年雇工听見，馬上頂了他一句。

那个管家碰了一鼻子灰就走了。过了一会，董家的少东家亲自来了。他看見大家都繃着臉不理他，皮笑肉不笑的对一个老头說：“喂，三毛五干不干？”

“三毛五？你到別处去雇吧！咱們得五毛，少一个子儿也不干！”剛才那个說話的青年雇工耳朵最尖，胆子又大，他赶忙替那个老头回答了。

那个地主的儿子气憤憤地走了。到这时候，上哪里去找人呢？麦子早就熟了，一場大雨，爛在地里了，那还得了？轉了几下，他又走回来了，問大家四毛錢一天干不干？大家还是不吭声。他只好咬了咬牙，掏五毛錢一天雇人去割麦子。雇工們这才懶洋洋地站起身来，拿着镰刀跟着他走了。

赶走反动校長

1928年夏天，我从蠡县高級小学毕业了。組織上叫我轉入县立师范念書，繼續进行革命活动。

当时，县立师范的校長叫張肇宜，是一个反动分子，他和蠡县的县長、警察局長、稅务局長穿着連襠褲，是县里四大劣紳之一。这个家伙的私生活非常腐敗，养了几个姘头。在学校里面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就甭提有多坏了：学校里的經費、办公費、学費等等，他拿到了手，既不購買圖書仪器，又不添置桌椅板凳，都放到他的腰包去了。这且不說，那时，“五四”运动已經过去了好几年，全国許多学校都教白話文了，我們那个学校，还提倡文言文，叫我們这些十几岁的娃娃，去讀什么“孟子”、“文法津梁”。那个頑固校長，还作了一首歪詩来諷刺新詩：“黑云滿天，大雨驟下，大一陣小一陣，下得溝溝壕平。”他說：“这象什么詩呢？真是狗屁不通！”我們学校里的共青团員們都挺恨他，决心要把他搞掉。

要把張肇宜这个家伙赶走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！且不

說他是一條地頭蛇，和反動政府有勾結，就說我們學生們的思想情況，也很混亂。在我們的同學里边，就有三種人：第一種，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共青團員和革命學生，他們一心一意要把這個反動校長攆跑。第二種，是還沒有弄清是非的同學，他們關心的只是怎樣把書念好，從來不過問校政。這種人在我們學校里最多，是中間分子，他們大都是從宋崗小學來的。第三種人，以劉崇書、劉芝堂等為代表，復古思想最濃厚，他們堅決擁護校長繼續掌握校政，還收集情報，向反動校長告密，想利用偽縣大隊的力量來打擊我們。這種人是少數。當時，我是縣立師範共青團的宣傳委員，我和同志們一商量，大家覺得環境太惡劣了，單靠我們共青團搞是不成的。我們向上級黨委請示了一下，黨指示我們首先要爭取群眾，把中間分子爭取過來，孤立頑固派，等大多數人都站到我們這一邊來了，就一下子把那個頑固校長攆跑。

在我們學校里，有兩個群眾組織，一個叫“爭取自由大同盟”，另一個叫“反帝大同盟”。這兩個群眾團體里，做工作的多是一些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。我們商量之後，決定通過這兩個群眾組織來爭取同學。我們經常和同學聊天，和他們談論時事，還送了許多宣傳品、小冊子給他們。有一位叫劉得漢的同學，是從原來的宋崗小學來的，功課很好，在同學們中的威信挺高。我們把他一爭取過來，宋崗的同學都站到我們這邊來了。

我們的力量比從前強大得多了。請示过上級黨委，事不宜遲，我們決定馬上把這個頑固透頂的校長趕掉。

在趕走校長的那一天，我們學校熱鬧極了，滿院子都是同學，把校長住的那間房子包圍起來了，里三層外三層，圍成一個鐵桶一般。有一個同學的嗓門挺大，站在前面領着大家呼口號：

“打倒反動校長！”

“反對腐化分子！”

“張肇宜滾出去！”

我們共青團員還到他的宿舍里去攆他。誰知道那個家伙的臉皮挺厚，賴在那里不肯走。有一個姓馬的同學胆子挺大，“咚咚咚”

地跑到校長的宿舍里，七手八腳把他的行李、書籍都扔到學校門外。那個家伙看看實在沒有辦法再賴下去，便灰溜溜地走了。”

以後，這個學校的校長、教員等，除了一兩個較好的我們把他留下，其餘的都換成了我們的人。到了1930年前後，學校里大部分學生都成了共青團員了。後來，我們蠡縣師範學校給黨培養了許多革命幹部，對博蠡兩次起義和抗稅鬥爭的作用不小，怪不得有人把蠡縣師範叫做“紅色的搖籃”。

抗稅鬥爭

我在青年時代所參加的一次最激烈的戰鬥，要算是抗交屠宰稅的鬥爭了。事隔二十多年，現在回想起來，還象是昨天的事情。

當時我們蠡縣也和國民黨反動派所統治的其他城市一樣，捐稅多如牛毛，把老百姓的血差不多都抽干了。這裡單說屠宰稅一項，就征收得非常苛刻，也很不合理：我們縣里的屠宰稅，縣里稅務局先把它包給一個姓陳的包商。這家伙，又把北區的稅務，轉包給我們鬥爭過的那個姓閻的惡霸。

1930年年底，快要過春節了，家家戶戶要是日子還能過的，都殺豬宰羊準備過年。這時，姓閻的又叫人背着一個褡褢，滿村滿鄉的去收一項奇怪的稅款：屠宰稅。凡是屠宰豬羊的，不管是拿到市場上去賣，也不管是留來自己吃，一律要交稅。老鄉們聽到這個消息都氣炸了：豬秧是自己出錢買的，肥豬是自己喂的，過年殺了是自己吃的，為什麼還要交稅？城內西區有些有名望的紳士如何子仁等，也覺得這樣還要收稅，實在是“于理不合”，對縣稅務局和姓閻的包商，頗有意見。我們研究了當時各方面的情況，就決定領導大家進行一次抗稅鬥爭。

1930年12月12日，正是城里市集的日子，我們共青團員全部人馬一齊出動，到市集上去宣傳，組織抗稅鬥爭。老鄉們一聽說有人出來抗稅，都哄起來了。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說要到縣政府去請願，誓死不交屠宰稅。

這天，各鄉的農民聽說城里要抗稅，都套着大車，騎着牲口，帶

着窩窩头和烙餅到城內請愿。到了晌午，在城內南門的牲口市上，街道上，集合了一万多人，真是人山人海，把一个小小的牲口市場，挤得水泄不通。我首先在会上講話：

“老乡們，反动派不叫我們过年了。猪是我們出錢买来的，又不是偷来的搶来的；猪秧是我們辛辛苦苦喂大的，又不是政府派人幫我們喂的；过年我們把猪杀了，留給自己吃，又不拿到集上去卖錢，为什么还要收稅，杀一口猪要我們六毛錢？我們大家去向縣長請愿去！”

当时，大家的情緒非常激憤，到处是“請愿去！請愿去！”“反对苛捐杂稅！”“誓死不交屠宰稅！”的呼声。接着群众就开始游行。蠡县党的負責人王知远同志在后面指揮，領導這場斗争。

当时，参加游行的人很多，許多本来是来赶集的，都涌进队伍来了，都要到县政府去請愿。这时，滿街滿巷尽是人流，真是声势浩大到了极点。請愿队伍到县政府前面，把县府里的人都吓坏了，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，不敢開門。我們派人去把縣長“請”出来，要他下令取消屠宰稅，否則即搗毀县政府。縣長毛丕恩看見我們人多势众，不敢不答应。他說：

“諸位！諸位！咱們是乡亲里道的，有什么事不好商量？我看，这次屠宰稅就暂时免征罢。不过，这个稅是由省府規定的。要取消，我們得向省府請示請示。”

我們看見目的已經达到，請示了一下党的負責人，决定宣布暫時回乡。队伍还没有解散，有一个老乡問：“要是有人下乡收稅怎么办？”我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大家就异口同声說：“打死他！”一万多人的游行队伍，就打着得胜鼓分散回乡了。

春节一晃就过了。老百姓的猪肉已經吃到肚里，就是省主席亲自来收稅也晚了。姓閻的那个二包商变得灰溜溜的，再也不敢提收屠宰稅的事了。

（本刊記者黃伊整理）

共青团——我的母亲

溫 济 泽

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1930年5月的事。那时我十六岁，在江苏淮阴中学念书。

在我入团的时候，淮阴中学团支部有十几个同志。我们加入青年团，都是因为对国民党极其不满，要起来反抗国民党的统治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，也就是北伐战争的时候，我们的年龄都很小，还不了解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模模糊糊地知道革命是好事，把军阀打倒了，社会就会好起来。但是，北伐战争结束了，军阀被赶跑了，国民党上了台，一切都还是老样子，而且国民党的卖国、专制、贪污、腐化、压迫和屠杀人民，都比旧军阀更厉害。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变好呢？许多知识青年都陷入苦闷中，想找一条出路。当时在淮阴中学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。党员同志接近了我们，把我们引导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道路。

1930年5月的一个星期日的早晨，我们得到支部书记的通知，要大家扮做郊游的样子，到离城三十多里的一个小学校里去开支部会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支部会。我们派一个同志在学校门口把风，其余的人就在教室里开会。这次会议是听党的淮阴县委的一位同志做时事报告。他讲的是革命根据地的和红军打胜仗的一些情况。他还说，离江苏不远，在安徽境内，也有了红军游击队的活动。我们听了，简直象在大海里找见灯塔一样地高兴。

不久，我在淮阴中学被开除了，到南京，扬州，以后又到上海读书。我又在这些地方参加了青年团的活动。我们经常要想出种种办法来躲开敌人的眼睛，秘密地开会。南京的紫金山上，扬州城外的寺庙里，上海的亭子间里，都曾经是我们会集的场所。每次开会，我们总是先商量好口供，准备在被捕的时候对付敌人，免得说出互相矛盾的话，被敌人鑽空子。

我还記得1931年11月6日在上海召开各大学团支部書記联席会议的情形。这是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。开会地点在当时法租界一条僻靜的弄堂的一个亭子間里。我当时担任复旦大学的团支部書記。我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門口,看見三楼亭子間的窗門一扇开着,一扇关着。这是“安全”的暗号。我和同时到达的兩個不相識的同志走进去。房間里已經来了十几个人。一会儿,省委的一位同志来了。他讓我們准备好口供,然后他就作了关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报告。我們知道了:紅軍又打了胜仗,革命根据地又扩大了,苏联第一个五年計劃得到了惊人的成就等等。我們的兴奋和激动是沒法形容的。

团还时时刻刻教导我們学习革命的理论。可是当时講革命理论的書很少,能够輾轉地秘密地傳到我們手里的就更少了。我記得我入团以后讀的第一本書是瞿秋白同志写的“三民主义”。这是一本批判三民主义的書。后来讀到了“共产国际綱領”。又过了一些时候,才讀到“反杜林論”这类經典著作的譯本。我們还讀过党中央和团中央出版的一些报刊。当时沒有正确而且通俗的哲学、政治經濟学的書。我們讀过德波林的“伊里奇的辯証法”,考茨基的“資本論解說”,河上肇的“經濟学教程”之类。現在看起来,这类書有很多缺点和錯誤,可是在二十多年前,我們却把它当作珠宝。当时讀書是不自由的。藏有革命書刊的人,被查出来,就会坐牢。甚至有人讀“馬氏文通”和“紅樓夢”,也都遭了殃。因为国民党里有些家伙不学无术,昏庸无知,把“馬氏”(前清研究語法学的“馬建忠”老先生)誤認為“馬克思”,把“紅”当作“赤化”。因此,我們拿到秘密的書刊,只能偷偷地讀,在家里关起門来讀,裝病睡在被窩里讀,或是在廁所里讀。我們当时的理論水平很低,对于書里所講的許多問題是弄不懂的,但是有一点心里是清楚的,就是覺得人压迫人、人剝削人的社会是不合理的,总得想法子改造这样的社会。因此慢慢地有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决心,就是: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美好的春天,我們应当为它的实现奋斗到底。